

珞珈中国哲学

# 中国哲学与日本文化

徐水生 著

中华书局

## 珞珈中国哲学：通向未来 中国哲学的一条可能之路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的“一大事因缘”，就是新的知识分类体系的逐步确立。而在这一新的知识分类体系里，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从传统的经史子集里分离出来。由于这样一个完全属于外来知识体系的新学科没有自己的历史及其固有的形态，在 20 世纪初期只能仿照西方的哲学学科体系来构造“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知识体系，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反向格义”（刘笑敢语）的思想史的创作过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两代学人就中国哲学史教学体系与研究方法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哲学史观与方法论问题，展开了多次研讨争鸣，认真反省“中国哲学”学科与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述了对中国哲学自身身份认同的焦虑。

其实，在 20 世纪初期，有关“中国哲学”概念的具体内涵，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诸先生都曾给出过自己的界定，如金先生在为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时，就区分了“中国哲学的史”和“在中国的哲学史”这二者的不同，而他本人则倾向于用一种没有“成见”的态度写一种“在中国的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 1961 年版）。而冯友兰先生本人在其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绪论中就明确地说，他是“就中国历史上各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明显地以西方哲学学科为标准来写一本“在中国的西方哲学史”。张先生则辨析了“中国人的哲学”与“中国系的哲学”的差异，认为，“中国人的哲学”可以包括印度系的哲学如佛教哲学，而他所

写的《中国哲学大纲》则主要是“中国系一般哲学”(《中国哲学大纲》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在进入21世纪后的今天,谈论“中国哲学”问题,有一个不容抹杀的思想史事实,那就是:20世纪的现代思想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了。在这样的历史起点上谈“中国哲学”问题,就无法回避已被纳入到中国思想传统的西方哲学思想,特别是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历程而言,近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化则是一个短期发展的结果,但它对于未来的中国而言却又有着极其重要的方向性意义。中国文化究竟该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近一百多年来的文化论争已经基本上给出了一个大致的方向,那就是立足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广泛吸纳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走综合创新之路。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不可能偏离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方向,也将走一条“综合创新”的道路;而如何“综合创新”,则将是言人人殊,各有胜途。

武汉大学地处中国大陆中部,是全国少数几个比较有名的以文科见长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哲学学院在全国哲学界得到广泛的认可,是比较少有的学科齐全、学术传统深厚的哲学教学与科研单位之一。其中,中国哲学研究群体及其研究成果,不仅在中国大陆得到同行专家们的首肯与赞誉,在国际学术界也有相当的影响。我们这个中国哲学研究群体,是以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陈修斋、杨祖陶、刘纲纪先生等老一辈学者为第一代开创者,强调为学与为人的统一,主张德业双修;以史论结合、古今贯通、中外对比为宏观研究构架,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内在契机与生命力为基本学术出发点,平章儒道墨释,涵化中印西马,认定明清之际为中国学术与文化的近代性的生长点,吸收并扬弃了梁启超、钱穆、侯外庐等人有关明清三百年学术研究的思想成果,将中国文化“自万历到‘五四’的三百多年的自我更新历史看作是一个同质的近代文化的运动过程”,从而论定,中国文明在世界性的由国别史向世界史迈进的进程中,是少有的几个具有原生、内发现代文化形态的主要文明形态之一。在第一代学人开创的事业基础之上,第二代、第三代学人,一方面深化前辈学者的许多固有的学术

问题,另一方面也根据新的学术发展情况,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在现代新儒家思想研究、新出简帛文献中的哲学思想、佛教禅宗哲学研究等领域,做出了新的贡献。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进一步地走向世界,世界也在进一步地走进中国。中西比较哲学也将成为本哲学研究群体新的生长点。

本套丛书,主要展示了近几十年来在珞珈山下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第二代、第三代部分学人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中国哲学研究在中国大陆中部地区最新进展的大致轮廓。丛书以中国本土的哲学思想为主要内容,其中有少量涉及中西比较哲学与比较宗教学思想。这些内容反映了珞珈中国哲学第一代学人“汗漫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西”的宏伟学术理想,正在第二代、第三代学人的学术活动中慢慢地实现着。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在当前的语境下谈“中国哲学”,可以分成“中国人的哲学”和“在中国的哲学”两大类。所谓“中国人的哲学”,即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创造出来的哲学,而“在中国的哲学”,则是指来自西方、印度等域外而在中国被传播、接受、研究的哲学。“中国人的哲学”当然离不开“在中国的哲学”,但又不完全依赖于它,而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与民族的问题,乃至当今世界的问题,依据自己民族的固有思想资源,整合其他民族思想资源,提出一整套哲学的解决方案或思想方案。这便是“中国人的哲学”的主要内涵。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珞珈中国哲学,是一条通向未来中国哲学的可能之路。它揭示了这样一种学术理想:居住于珞珈山下的中国哲学研究群体将努力依据中国固有的思想资源,整合其他民族的思想资源,创造出一种“中国人的哲学”。这是一个目标,是一种学术理想,目前的这套丛书与此目标和理想还相差很远,但可以看作是通向此目标与理想的一级台阶。

是为序。

吴根友

2008年2月4日

# 一、中国古代哲学 与日本近代化



# “日本近代哲学之父”的历史选择

## ——西周与中国古代哲学

西周(1829—1897)是日本第一位较系统地将西方近代哲学介绍到扶桑诸岛,并创译了许多至今仍在使用的哲学术语的哲学家,故被称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船山信一语)<sup>①</sup>。他在介绍和创译的过程中,始终将中国古代哲学作为沟通东西文化的重要媒介。从明治初期的文化背景来说,这不仅是西周的文化素养所致,而且也是日本近代哲学发展的历史必然。

### 一、东儒西哲“其实一也”

西周,幼名经太郎,长称周助,后更名周。石见国(今岛根县)津和野人,家世业医,任幕府“直参”、“开成所”教授,沼津兵学校校长等职。明治六年(1873),与森有礼、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等共创启蒙学术团体“明六社”,并出刊《明六杂志》。他不断地在该杂志上发表论文,介绍西方哲学,进行启蒙活动。明治维新后,从1870年起开始先后在明治政府兵部省、文部省任职。晚年任元老院议官、贵族院议员,被授予男爵勋位,赐瑞宝章,西周一生著述颇丰,共有80余种。主要哲学著作有《百学连环》、《百一新论》、《灵魂一元论》、《生性发蕴》、《尚白札记》、《人生三宝说》、《知说》等,西周对东西方哲学均有深刻的了解。

#### (一)中国古代哲学的熏陶

西周很早就接受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教育。祖父兼内外科医生,对

---

<sup>①</sup> 船山信一:《日本の观念论者》,日本英宝社1956年版,第36页。

儒学颇有研究,父亲也是医生。西周自幼由祖父亲自授书教学,4岁读《孝经》,6岁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12岁进藩学开始接受严格的汉学训练,遍读《周易》、《尚书》、《诗经》、《春秋》、《礼记》、《近思录》(朱熹、吕祖谦)等蕴藏着丰富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要典籍(见西周《自传草稿》)。西周曾经回忆自己的学术思想轨迹说:“余也少而家庭之训诲,遵诸公之指导,以略得与闻圣贤之大道。”曾沉潜反复于《二程全书》、《正蒙》、《朱子语类》等书,“而奉诵有年,尝得其居敬惺惺之法而日行之,几如禅僧入定,然而自谓其道至矣尽矣,不可以加也”。“年十六七,略得读《左》、《国》、《史》、《汉》(即《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引者注)其他诸家之书,退而夷考诸宋学,其气象全然别矣。”<sup>①</sup>

西周18岁时,偶患小病,需卧床休息数日,闲来无聊想看书。按当时的日本读书人规矩,卧看圣贤之书、濂洛之籍均属不敬,故找来日本古学家荻生徂徕的《论语征》,此书不属圣贤之书,可以卧看,越看越有味,连读三遍,渐通其意,“于是乎始知诸家不全非,程朱不可全信然也,乃又得徂徕集读之,读未一半而十七年之大梦,一旦而醒觉”<sup>②</sup>。徂徕学的创始人——荻生徂徕乃日本德川时代中期的哲学家,5岁自学汉文,先信奉朱子学,后尊崇孔孟之学,他认为只有先秦儒学才有真义,后来学问全是伪说,继而批判宋学。正如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家所指出:徂徕仍是“中国思想的祖述者”,其“价值基础仍取自中国古代儒家之书”<sup>③</sup>,因而,西周从程朱之学转向徂徕之学并未离开儒学,而是在儒学思想体系中由信奉此派而转向彼派。西周还任过教授儒学的先生。他21岁时获准游学大阪三年,先后在大阪的松阴塾、冈山的冈山学校学习儒学,毕业后任培达塾塾夫(私塾学长),兼任授读教官。1853年7月,西周到达江户樱田门户新桥的藩邸,任“时习堂”(以学儒学为主)的讲释,负责每月十六日的讲经。看来在早期的家庭启蒙、学校教育 and 后来任儒学教官时期,西周阅读了自先秦诸子至宋代哲人的

① 大久保利谦编:《西周全集》第一卷,日本宗高书房1950年版,第3—5页。

② 大久保利谦编:《西周全集》第一卷,第5页。

③ 吉川幸次郎:《仁斋、徂徕、宣长》序,日本岩波书店1975年版,第77页。

大量著作,从而奠定了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和日本儒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 (二)西方近代文化的滋润

1854年冬天,西周随藩邸的医师野村春岱读荷兰文词典,同时跟桑本才次郎学习数学。28岁开始学习英文,后任“藩书调所”助教。在调所期间,他接触到较多的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尤其在出国留学之前,他对西方近代哲学与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近来我窥视西洋性理之学和经济之学,实是可惊叹的公平正大之论,与从前所读汉学有很大不同。虽然今天西洋所崇奉的耶稣教胜过佛法,但不取卑陋之极的只有哲学之学,它论述性命之理超过程朱,本于公顺自然之道,建经济学之大本,胜于所谓的王政。”<sup>①</sup>他从东方传统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的比较中,看到了后者值得肯定的长处。

1862年,西周作为日本幕府派遣的首批文科留学生去荷兰留学,随莱顿大学法学博士维塞林学习社会科学。维塞林是荷兰当时著名的法学家,也是有影响的实证主义哲学家。通过维塞林,西周系统地接收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和穆勒的功利主义,此外,他还学习了康德等其他西方哲学家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进化论等。这些新的思想文化和思维方法对他的哲学创造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三)重新审视儒学

西周经过三年的留学从荷兰归国后,站在时代的新高度,用世界文化的新视角,重新审视了东方儒学。

一方面,他指出了儒学有着严重的弊端,如儒学“对政(政治学、法学)、教(道德学)的思考的确混乱”<sup>②</sup>。二者差别在孔子学说中就不大明确,到了程、朱之时便更加模糊。实际上,政治学、法学均应从道德学分离,独立成为一种学问。“政、教”二者本身具有不同的功能,“今若区分,法者治人之工具,教者治身之工具。……但仅就名状说,法之

<sup>①</sup> 《西周全集》第一卷,第8页。

<sup>②</sup> 植手通有编:《西周、加藤弘之》日本名著第34卷,日本中央公论社1984年版,第106页。

思想以‘正’为主,教之思想则以‘善’为主,……正和善是分明不同的思想”<sup>①</sup>。在这里,西周批判了儒学历来主张的政教合一的思想。他还认为儒家有过于重古之弊病,“汉儒所以不至卓绝者,因泥古二字”。

另一方面,西周又充分肯定了儒学的合理性。他认为,哲学在“西方世不乏人”,而在东方,兴于孔孟,盛于程朱。孔子的正名论、公孙龙的坚白异同之辨,均是逻辑意识的体现。“东土谓之儒,西洋谓之斐尔苏比〔philosophy(哲学)一词日语之音译],皆明天道而立人极,其实一也。”<sup>②</sup>即以儒学思想为代表的东方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相比,虽二者形式有异,但实质为一,都是探求自然规律和人生真谛的学问。这实际上是充分肯定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东方传统哲学中所包含的普遍性和合理性。正是基于此种深刻的认识,西周颇为自觉地以汉学为媒介来系统传播西方哲学思想和创建日本近代新文化。

## 二、宇宙进化论与阴阳学说

西周在欧洲留学期间接触到生物进化论和近代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理论,回国后便将这些理论知识运用到其哲学创造活动之中。由于东方传统哲学在他思想深层的影响,也由于西方文化日本化的需要,他往往通过将阴阳学说和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相结合来阐述宇宙进化和发展的道理。

### (一)静力、动力和阴阳

西周认为自然界发展、进化表现为许多方面,但归根到底是由阴阳两方所组成,他说:“物实为阳极,虚为阴极,其于色,白为阳极,黑为阴极,七色为中间之象。其于知觉,热为阳极,寒为阴极,温暖为中间象。其于光,明为阳极,暗为阴极,若太阳之光辉,阳极大甚。其于有机性体,生为阳,死为阴,少则向阳,老则近阴。其于无机性体,金土是阴,火气是阳……凡此皆阴阳罗织为章。”<sup>③</sup>如仅就“阴阳罗织为章”来

① 植手通有编:《西周、加藤弘之》日本名著第34卷,第93—94页。

② 《西周全集》第一卷,第575、19页。

③ 《西周全集》第一卷,第213页。

看,似乎无多大新意与古代哲学接近,但它是以有机体和无机体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从而为“阴阳”学说注入了时代的新内容,在旧形式下透露了新思想。

西周在其 50 岁时写作的《兵赋论》中将此点表现得更为明确,认为世界万物存在着“静力”和“动力”的矛盾斗争,从矿物、植物、动物到人类,都是这类矛盾的相消相克,“矛盾斗争进行时,人们快乐地享受着人生。矛盾斗争结束时,人们在墓石下分解,归于原来的静力。天地万物常在矛盾斗争中形成,不论在智慧、社会里,还是在贸易、战争中,一切生气、活气、壮盛,均因这种动力而形成。这种静力和动力在中国书中称为阴阳,即阴阳相合乃生万物”<sup>①</sup>。静力、动力本是西方近代物理学家提出的术语,阴阳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但西周在创建日本近代文化的过程中将二者结合,用人们所熟悉的知识和道理介绍了新的自然观。

## (二)万物形成与“两仪生四象”

西周在 1870 年写的《复某氏书》中说:物流动之妙产生四象之运化,“四象的运化产生三界万物,即金石界、草木界、人兽界,据此三界的万物人工穷其源,兹能得四元气三十六金二十有余土,凡此取名为理,即形气家所称的道理。其学即格物学、分析学、金石学、植物学、生物学、地质学、考古学、天文学、晴雨学。知其以上实质的运行,求其对偶得一虚体,观此虚实动静二体相关之状,乃得四元。推此四元以三界之形迹,可感知造物主的灵妙不测,以形气家之理,究极性理之蕴奥,知人生之大本,将此作性理家之道理,其学即是致知学、心性学、礼教学、性法学、政法学、国法学、刑法学、商法学、公政法学、公法通学等”<sup>②</sup>。这段内容似乎有些费解,然而它实际上是通过《易传》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宇宙生成模式和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结合,来说明世界的形成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分化,即最初物中的阴阳对立产生了无机物、植物、动物、人类

① 植手通有编:《西周、加藤弘之》日本名著第 34 卷,第 168 页。

② 大久保利谦编:《明治启蒙思想集》,日本筑摩书房 1983 年 10 月版,第 26 页。

等万物,人们根据其中的“阴阳”道理(“求其对偶”、“观此虚实动静”),建立了相应的地质学、植物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继之又创立了社会科学。这里确实有些新旧杂成的现象,但对于从中世纪走向近代化的明治日本文化来说,它又是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

### 三、近代知识论与“知行”学说

知识论是西方近代哲学的“重镇”,几乎没有一个大哲学家不涉足于此。同时它也说明,随着历史的发展,知识在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中越来越显得重要。西周深明此理,为了加速日本的近代化,便积极介绍西方的知识论。他在介绍中同样利用了其深深掌握的中国古代哲学的知识。

#### (一)“学术之源在知行”

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西周曾认真考察了西方近代“学术”一词的词源,并借用中国古代哲学的“知行”观来通俗地说明西方的“学术”思想及其形成基础。在儒学中,一般来说,“知”指认识、知识;“行”指行动、行为、实行。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认为知分为天赋的知和经过学习才能得到的知。荀子说:“知之不若行之”,强调实行的重要。宋代以后,知行问题受到更多的注意。程颐认为,知先行后,知难行也难。朱熹提倡知行相须,不可偏废,认为:“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sup>①</sup>这些观点对西周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东西文化的背景下,西周指出:“学术之源在知行二者,知和行有其区别,如何也不能视之为—。知之源是因五官之感所发,自外入内,行是依其知由内出外,故知先行后,知是面对过去,行是面对未来。知归之广,行归之约。”<sup>②</sup>由于他以中国古代哲学范畴作媒介来介绍西方的近代思想,从而减轻了人们对异质文化理解的难度。

① 《朱子语类》卷十四。

② 大久保利谦编:《明治启蒙思想集》,第48页。

## (二)主张“大知”,反对“小知”

西周主张知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即“大知”,避免知识的零碎性和片面性,即“小知”。根据他的《知说》篇,其知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是以“语文、数学、历史、地理”为基本内容,以演绎和归纳为主要方法,以求得真理为最终目的,具有明显的近代性。西周所用的“大知”与“小知”是庄子哲学的概念。庄子曾说:“小知不及大知。”<sup>①</sup>“大知观于远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无穷。证向今故,故遥而不闷,掇而不跂,知时无止。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明乎坦涂,故生而不说,死而不祸,知终始之不可故也。”<sup>②</sup>庄子提出“大知”与“小知”的思想,以说明视野开阔、头脑清醒的大智者,能全面、发展、辩证地看问题,并批评小知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西周将两个概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提出了知识论的新思想,他说:“小知即平常的知识,在有限程度上高于凡庸者,如同某人立于稠众密群之中,看之视野不超过前后左右。行之又必推前者、挤后者、冲左者、碰右者。”“大知与此相反,如立于一高台之上观台下稠众,对于数万人可以一目了然,视野不受前后左右所限,行动亦得当。”<sup>③</sup>西周并对二者展开了详细的比较,认为,小知是一种知,似丝,大知是一系统的知,如一匹布;小知似穴居木楼,只能栖住一人,大知如高楼大厦,可容多人安身;小知似一猛夫格斗,大知如摆开了强大阵势之军;小知似一工人简单制作,大知如集众工之巧生产精品。由于西周在论述中运用了庄子哲学范畴,因而使他的知识论即保持了近代性,又具有浓厚的东方文化色彩。

## (三)“智、情、意”的心理学

自18世纪中叶起,心理学开始逐渐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到了19世纪便初具规模。西周在荷兰留学时也学习了这一当时的新兴学科,回国后并进行了介绍。但在介绍中,他明显地模仿中国古

① 《庄子·逍遥游》。

② 《庄子·秋水》。

③ 植手通有编:《西周、加藤弘之》日本名著第34卷,第203页。

代医学哲学著作《黄帝内经》的某些术语和借用了其整体思维方法。如《内经》将人的内脏分为十二官，“心者，君主之官；肺者，相傅之官；肝者，将军之官；胆者，中正之官”，并强调这些器官的有机联系和整体功能。西周的祖父和父亲均是熟悉中国古代医学经典的医生，他通过先辈们很早就接触到了《内经》这部经典，并在后来传播西方文化中得以运用。西周说：“心理之分解，首别三大部，智、情、意是也。三者之中，意之为主，而此我者即是也。若他二者，则有吾不得左右之者而存焉。……故曰意者心之主部，而智、情为辅佐之机官也。”“意，是人心之主，即为心诚之君主。而智为采纳之官（又曰报告官），情为宣达之官。采纳之官司入，宣达之官司出，共居心城，辅相心君，以开其属府于此身国。”“智情意虽区而别，元一体之心，因其发动之异别名称，以表吾人之观念而已。三者相关，亲密不可得划然为分别。譬诸一流水，指体曰水，犹吾心，指其动曰流，犹言意，故有心斯有意，犹有水斯有流。”<sup>①</sup>其主要理论或思想虽是对西方心理学的介绍，但其概念和方法与《内经》哲学有着深深的联系。这一方面表明西周对西方近代心理学理论了解不深，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西周试图使心理学理论日本化的初衷。

#### 四、“人生三宝说”与儒学的价值观

儒家不论在伦理观，还是在学问观上，都强调其政治功能、社会价值，西周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其利弊，并在建立日本新文化中扬弃了儒家的这一思想。

##### （一）“人生三宝说”与“修、齐、治、平”

西周思想近代性最大的体现之一就是提出了“人生三宝说”，这种学说吸取了穆勒的功利主义思想，它对于要求自由平等、要求个性解放，对于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对于日本现代化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进步作用。然而，西周即使在论证这种近代功利主义学说之时，也没有离开与儒学的联系。

<sup>①</sup> 《西周全集》第一卷，第130、131、138页。

西周指出：“所谓三宝者何也？第一，健康；第二，知识；第三，富有。”“三宝”的反面是“疾病”、“愚痴”、“贫乏”，又称为“三祸鬼”。他认为，人生的最大目的，就是驱逐三祸鬼，增进三宝，以达到人生之最大幸福，此乃道德之大本。“人之三宝无贵贱上下之别，其贵重同一也。如果三宝不受侵害，则人的百行自主自在也。”这实际上宣传了穆勒的人的本性是追求幸福，幸福就是一种利益的“最大幸福主义”思想。为了强调“三宝”的重要性，西周又说，“总之，人生百般之事，除了来世的祸福外，都不外乎靠此三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哪一件能离开三宝”<sup>①</sup>。因而，三宝不仅是“交人之要道”、“治人之要道”而且还是“治政之要道”。《大学》曾曰：“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西周继承儒家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相结合的传统，论述了西方近代的功利主义思想。这既是他个人知识结构在理论上的表现，又是当时日本人民接受外来文化的需要，并在日本近代史上产生了积极作用。

## （二）“学术统一”与“齐家治国”

西周还提出，“百科学术统一观”（哲学）与齐家治国有关。他说：“凡百科学术具有统一观一事至为紧要。如学术上建立统一观，则人类事业可就绪，社会秩序亦将自臻安定。人们各自事业真的就绪，社会秩序亦安定，苟无紊乱之事，其结果即康宁。若能致力于此一事，其结果家、国、天下自可富强。此康宁和富强二事实行，即生有所养死有所葬，人皆熙熙跻于寿考之城，是即幸福，幸福乃人道之极功。”<sup>②</sup>西周要求“百科学术具有统一观”的观点是受孔德思想的影响。孔德认为，他的实证哲学不是处于“五种实证科学”（1. 天文学；2. 物理学；3. 化学；4. 生物学；5. 社会学）之外，而是用实证原则把它们联系起来，并给它们以方法和原则。至于学术与家、国、天下相连的观点则是受朱熹思想的启发，朱熹说：“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

<sup>①</sup> 《西周全集》第一卷，第25—27页。

<sup>②</sup> 麻生义辉编：《西周哲学著作集》，日本岩波书店1933年版，第5页。

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sup>①</sup>因而，西周的上述观点是对孔德思想的吸收和朱熹思想的积极改造，它非常强调哲学的政治、社会功能，是一种东方型的近代学术统一观。

## 五、哲学新范畴的创译

范畴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时代理论思维发展水平的指示器，是帮助人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纽结。哲学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之一，是哲学范畴的清晰化、时代化，西周在此方面为日本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积极而认真地翻译、介绍西方近代哲学的范畴，但他的翻译不是生硬的简单的直译，而是融合了东方传统哲学思想的创译，或对东方传统哲学范畴实行富有时代感的引申。

### （一）“哲学”

在古希腊，哲学原词为“philosophia”，音为“斐禄所费亚”，意为“爱智”。西周参照中国宋代哲学思想，开始将“philosophia”译成汉字“性理学”、“理学”、“穷理学”。“性理”一词指心性、理性。关于“理”，张载认为，“万物皆有理”，“理”为物质运动的规律；二程认为，理是事物所以然者；朱熹认为，理是天地万物之“主宰”，是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推动者。故有时人们又将宋明儒家哲学称为“理学”。“穷理”也是宋代的重要哲学思想，二程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sup>②</sup>朱熹认为，“穷理便是穷究事物之中的理，从而体认本体的理”。但他将“穷理”更视为探究和发挥内心天理和善性的道德修养过程。随着对近代哲学认识的加深，西周便觉以上译语均不大妥。继之，他又说，“斐卤苏比（philosophia 之日语音译）之意如周茂叔说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意，故亦可将斐卤苏比直译为希贤学”<sup>③</sup>。后来他又将“斐卤苏比”译为“希哲学”，这可能受中国《尚书》类思想的启示。《尚书·皋陶谟》记载大禹语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

①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

②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

③ 《西周全集》第四卷，第146页。

民怀之。”《孔氏传》解释说：“哲，知是也。无所不知，故能官人、惠，爱也。爱则民归之。”经西周反复思考和进一步推敲，最后他在1874年刊行的《百一新论》中说：“把论明天道人道、兼之教法的斐尔苏比译名哲学。”<sup>①</sup>这样与英文原意的“爱智”十分吻合。由此可见，“哲学”一词是经过刻苦磨炼才创译出来的，而西周的中国古代哲学素养在其中起到了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

“哲学”范畴的产生，不仅仅是一个专业术语的翻译问题，而是标志着日本思想家对哲学这门学科的认识日趋成熟，它不仅仅对日本思想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通过留日中国学者的介绍，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 （二）“理性”

西周也是汉字“理性”范畴的创译者。“理性”原词产生于西方哲学，它一般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或思维活动。西方理性主义的共同特性是，只承认理性认识的可靠性，否认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经验。西周在1862至1865年留学荷兰期间所写的《开题门》一文中说：“宋儒和理性主义二者在说法上虽有不同，然也有酷似之处。”中国的宋儒们都非常重视理性，如程颐主张，至于物而穷其理，但不能逐物，必须“反躬”。朱熹提出了“即物穷理”的系统方法，认为，穷理多后，便能“豁然贯通”，内外合一。陆九渊强调“反观”，认为心便是理，只需向内反观，不必向外求索。王守仁提出“致良知”说，认为格物致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西方的理性主义者，如以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为代表的大陆理性派，认为感性知识不可靠，强调只有用数学推理方法才能得到真正可靠的知识，并认为观念的清晰明白就是真理的标准。中西二派虽说法有异，但在只承认理性认识是最可靠这点上确实有共同之处。可见西周对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和中国宋代哲学有深刻的理解。

西周在1870年左右写的《尚白札记》中，又作了如下注释：Reason广义使用时，可译为“道理”；狭义使用时，可译为“理性”。在1873年

<sup>①</sup> 《西周全集》第一卷，第289页。